

马克思 恩格斯 列 宁 斯大林

文艺理论著作选

武汉大学中文系编

一九七二年七月

毛主席语录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

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

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目 录

恩格斯：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摘录）	(1)
马克思 恩格斯：《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 第4期上发表的书评 评托马斯·卡莱 尔《当代评论。（一）当前的时代。（二） 模范监狱》（摘录）	(26)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摘录）	(34)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摘录）	(43)
马克思致斐·拉萨尔（1859年4月19日）	(49)
恩格斯致斐·拉萨尔（1859年5月18日）	(62)
恩格斯致敏·考茨基（1885年11月26日）	(72)
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1888年4月初）	(80)
列 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	(92)
列 宁：列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	(107)
列 宁：列·尼·托尔斯泰	(123)
列 宁：列·尼·托尔斯泰和现代工人运动	(134)
列 宁：托尔斯泰和无产阶级斗争	(140)
列 宁：列·尼·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	(143)
列 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摘录）	(153)

列宁给阿·马·高尔基 (1919 年 7 月 31 日)
.....(159)

列 宁：青年团的任务 (摘录)(169)

斯大林答比里-别洛策尔柯夫斯基
(1929 年 2 月 2 日)(175)

斯大林给阿·马·高尔基的信 (1930 年 1 月 17 日)
.....(181)

斯大林致杰米扬·别德内依同志 (摘自原信)
(1930 年 12 月 12 日)(188)

编选说明(199)

恩 格 斯

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¹ (摘录)

在歌德²身上发现“人”的功劳正是应该归于格律恩³先生的，但这个人不是男人和女人所生的、自然的、生气蓬勃、有血有肉的人，而是在更高意义上的人，辩证的人，是提炼出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坩锅中的 *caput mortuum*⁴，是《浮士德》⁵ 中的侏儒的 *cousin germain* [堂兄弟]，总之，不是歌德所说的人，而是格律恩先生所说的“人”。但是格律恩先生所说的这个“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

“歌德身上除了人的内容外没有别的内容。”（第 X V I 页）在第 X X I 页上我们看到，“歌德把人想象和描写成我们今天所希望实现的那样。”在第 X X I I 页上：“歌德在今天（他的著作也是如此）是人类的真正法典。”歌德就是“完美的人性”。（第 X X V 页）“歌德的诗篇是（1）人类社会的理想。”（第12页）“歌德不能成为民族的诗人，因为他的使命是作人的诗人。”（第25页）尽管如此，在第14页上“我国人民”即德国人仍然应该把歌德“看成自己本身的变态的本质”。

这里我们看到关于“人的本质”的第一个说明，我们完全可以信赖格律恩先生，相信他对“‘人’这个概念”毫无疑问地是有过极其深刻的“研究”的。歌德把“人”描写成格律恩先生所希望实现的那样，同时还描写了变态的德国人民，因此，“人”不外是“变态的德国人”。这是到处都可以得到证实的。正如歌德“不是民族的诗人”而是“人的诗人”一样，德国人民也“不是民族的”人民而是“人的”人民。因此，在第 XVI 页上我们读到：“从生活中产生出来的歌德的诗篇……过去和现在都和现实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人”也是这样，德国人也是这样。而在第 4 页上：“直到现在**法国**的社会主义还只是希望替**法国**造福；而**德国**的作家却面对着全人类。”（可是“人类”在大多数场合下却不是用“面”而是用身体上离面相当远并且与面相反的部分“对着”德国的作家）格律恩先生对于歌德希望“从内部把人解放出来”这一点在许多地方也都表现出自己的喜悦（例如见第 225 页），但是这个纯粹德国人的解放却仍然是“一场空”。

那末，我们现在就来谈谈这第一个说明：“人”就是“变态的”德国人。

我们来看一看格律恩先生根据什么认为歌德是“人的诗人”，认为“歌德身上有人的内容”。这种承认将极清楚地告诉我们，谁是格律恩先生所说的“人”。我们将看到，正如格律恩先生平常为了想竭力大声压倒自己所有的伙伴而常常向世界说出了其他弟兄们宁肯闭口不谈的东西一样，他在这里泄露了“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最隐秘的思想。由于歌德自己时常在比较夸张的意义上使用“人”和“人的”这些字眼，格律恩先生就轻而易举地把歌德变成了“人的诗人”。歌德使用这些字眼自然仅仅是指当时的人们以及后来的黑格尔⁶所使用的那种意义而言，那时，“人的”这个词主要是用在同异教的和基督教⁷的野蛮人相对立的希腊人身上，是指远在费尔巴哈⁸赋予这些术语以神秘的哲学内容之前所使用的那种意义而言。这些字眼，特别是在歌德那里，大多具有一种完全非哲学的、肉体的意义。把歌德变成费尔巴哈的弟子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功劳，是全部属于格律恩先生的。

关于歌德本人我们当然无法在这里详谈。我们要注意的只有一点。歌德在自己的作品中，对当时的德国社会的态度是带有两重性的。

有时他对它是敌视的；如在《伊菲姬尼亚》⁹里和在意大利旅行的整个期间，他讨厌它，企图逃避它；他象葛兹¹⁰，普罗米修斯¹¹和浮士德一样地反对它，向它投以靡非斯特非勒司的辛辣的嘲笑。有时又相反，如在《温和的讽刺诗》¹²诗集里的大部分诗篇中和在许多散文作品中，他亲近它，“迁就”它，在《化装游行》¹³里他称赞它，特别是在所有谈到法国革命的著作里，他甚至保护它，帮助它抵抗那向它冲来的历史浪潮。问题不仅仅在于，歌德承认德国生活中的某些方面而反对他所敌视的另一些方面。这常常不过是他的各种情绪的表现而已；在他心中经常进行着天才诗人和法兰克福市议员的谨慎的儿子、可敬的魏玛的枢密顾问¹⁴之间的斗争；前者厌恶周围环境的鄙俗气¹⁵，而后者却不得不对这种鄙俗气妥协，迁就。因此，歌德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有时是叛逆的、爱嘲笑的、鄙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则是谨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狭隘的庸人。连歌德也无力战胜德国的鄙俗气；相反，倒是鄙俗气战胜了他；鄙俗气对最伟大的德国人所取得的这个胜利，充分地证明了“从内部”战胜鄙俗气是根本

不可能的。歌德过于博学，天性过于活跃，过于富有血肉，因此不能象席勒¹⁶那样逃向康德的理想来摆脱鄙俗气；他过于敏锐，因此不能不看到这种逃跑归根到底不过是以夸张的庸俗气来代替平凡的鄙俗气。他的气质、他的精力、他的全部精神意向都把他推向实际生活，而他所接触的实际生活却是很可怜的。他的生活环境是他应该鄙视的，但是他又始终被困在这个他所能活动的唯一的生活环境里。歌德总是面临着这种进退维谷的境地，而且愈到晚年，这个伟大的诗人就愈是 *de guerre lasse*〔疲于斗争〕，愈是向平庸的魏玛大臣让步。我们并不象白尔尼和门采尔¹⁷那样责备歌德不是自由主义者，我们是嫌他有时居然是个庸人；我们并不是责备他没有热心争取德国的自由，而是嫌他由于对当代一切伟大的历史浪潮所产生的庸人的恐惧心理而牺牲了自己有时从心底出现的较正确的美感；我们并不是责备他做过官臣，而是嫌他在拿破仑清扫德国这个庞大的奥吉亚斯的牛圈¹⁸的时候，竟能郑重其事地替德意志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宫廷做些毫无意义的事情和寻找 *menus plaisirs*¹⁹。我们决不是从道德的、党派

的观点来责备歌德，而只是从美学和历史的观点来责备他；我们并不是用道德的、政治的、或“人的”尺度来衡量他。我们在这里不可能结合着他的整个时代、他的文学前辈和同代人来描写他，也不能从他的发展上和结合着他的社会地位来描写他。因此，我们仅限于纯粹叙述事实而已。

我们将看到，就上述哪一方面来说，歌德的著作是“人类的真正法典”，是“完美的人性”，是“人类社会的理想”。

我们首先来谈谈歌德对现存社会的批判，然后再来谈对“人类社会的理想”的实际的描述。显然，由于格律恩先生这部书的内容很丰富，我们在这两方面都只能引述一些最独特最出色的地方。

歌德作为社会的批判家实际上是在制造奇迹。他“诅咒文明”（第34—36页），他时常发出一些浪漫的怨言，说文明抹杀了人的一切特点和个性。他在《普罗米修斯》里 tout bonnement [简明地]描写了私有制的起源，从而“预告了资产阶级世界的来临”（第78页）。他（在第229页上）是“世界的审判官……文明的米诺斯²⁰”。但

是这一切都不过是小事情而已。

在第253页上格律恩先生引证《教义问答讲授》²¹：

孩子，想一想，你的礼物都是从哪里来的？

你不能够从你自己那里得来。——

唉，一切都是从爸爸那里。

爸爸又从哪里得来？——从祖父那里。

可是祖父到底是从哪里得来的呢？

他是抢来的。

好啊！格律恩先生放开嗓子喊道，la propriété c'est le vol〔财产就是盗窃〕——这才是真正的蒲鲁东！²²

勒维烈²³可以带着他的行星回家，并且把他的勋章让给格律恩先生了，因为我们在这里看到了比勒维烈的发现，甚至比杰克逊²⁴的发现和二乙醚蒸气的发现更伟大的东西。谁把蒲鲁东使许多安乐的资产者不安的关于盗窃的话和上述歌德的不伤害人的讽刺短诗混为一谈，谁就应该荣膺荣誉军团大十字勋章。²⁵

《市民将军》²⁶惹出的麻烦就更大了。格律恩先生把他从各方面打量了一番，破例地紧锁双眉，疑虑地说：“当然……十分无味……革命在这里并未受到指责”（第150页）……且住！

他终于发现了这里所谈的是什么问题！是关于**一瓶牛奶的问题**。因此：“不要忘记……这仍然是……被提到了首要地位的**财产问题**。”（第151页）

当格律恩先生住的街上有两个老太婆为了一个咸鲱鱼头而争吵起来时，请格律恩先生不辞辛劳，从他的“飘荡着玫瑰花和木犀草的微香”的楼房里走下来，向她们说，她们所涉及的也是“被提到了首要地位的财产问题”。一切善意的人的感谢就是对他的最好的报酬。

歌德写成了《**维特**》²⁷，是建立了一个最伟大的批判的功绩。《**维特**》绝不象那些“从人的观点”来读歌德的人至今所想的那样，是一部平凡的感伤的爱情小说。

在《**维特**》里，“人的内容给自己找到了如此恰当的形式，简直无法在世界上任何一部作品里找到哪怕是稍微可以和它媲美的东西。”（第96页）“维特对绿蒂的爱情，只不过是一种激情的泛神论²⁸的悲剧的杠杆和体现……维特是个没有脊椎骨的、尚未成为主体的人。”（第93、94页）维特的自杀不是为了恋爱问题，而是“因为他（倒霉的泛神论的意识）无法弄清自己和世界的相互关系”。（第94页）“在《**维特**》这本书里，用艺术的手法揭露了社会的一切腐败现象，指出了社会弊病的最深刻的根源，它们的宗教哲学基础（大家知道，这个“基础”

的产生要比“弊病”晚得多) 29 以及和它们同时出现的认识上的模糊不清……关于真正人性的纯正、清晰的概念 (不过首先是脊椎骨, 格律恩先生, 脊椎骨!) 30, 也就是那种鄙俗气, 即那种被称为日常生活的周身被蠹蚀了的秩序的死亡。”

这就是在《维特》里用艺术手法揭露“社会的腐败现象”的范例。维特写道:

奇闻异事? 为什么我要用这个愚蠢的字眼? ……我们的日常生活, 我们的虚伪的关系, 这才是真正的奇闻异事, 这才是令人惊奇的事情!” 31

富于幻想的好哭泣者对横跨在市民的现实和自己对这个现实所抱的同样是市民的幻想之间的鸿沟所发出的这种绝望的哀号, 这些完全由于缺乏起码的经验而发出的悲叹, 格律恩先生在第84页上硬把它们说成对社会的一种尖锐而深刻的批判。格律恩先生甚至硬说, 上述引文里所表现出的“生活的无限痛苦, 这种想把一切颠倒过来, 以便使它们 (哪怕是一次也好) 改头换面 (!) 的病态要求, 归根到底给自己敷设了法国革命的轨道”。革命在前面被看做马基雅弗利³² 主义的实现, 而在这里却仅仅变成了少年维特的烦恼的实现。在革命的广场上树起的断头台原来不过是维特的手枪的可怜的摹制品。

此后我们就用不着惊奇：歌德在《斯苔拉》³³中，如第108页上所说的那样，也研究了“社会的材料”，虽然在这部著作中只描绘了“极其可怜的情况”（第107页）。“真正的社会主义”无所不在，简直赛过我们的主耶稣。只要那里有两三人聚集在一起（虽然决不是因它而聚集起来的），它就出现在那里，并且硬说那里有“社会的材料”。就象它的信徒格律恩先生一样，它同“那种庸俗而又自满的、什么都要过问却什么也不懂得的、无孔不入的人”（第47页）是相似得颇为惊人的。

我们的读者也许还记得威廉·麦斯特³⁴给他姐夫写的一封信（《修业时代》的最后一卷），他在信中说了些关于生长在富贵人家的优越性等十分庸俗的话之后，承认贵族对小市民的优势地位，确认小市民及其他一切非贵族阶级的不平权的地位在最近期间是不应改变的。只有个别的人在一定情况下才有可能上升到贵族的水平。关于这一点格律恩先生说：

“如果把社会的上层阶级和有教养的阶级看作同一的东西，那末歌德所说的关于上层阶级的优势地位的话，无疑是正确的，而歌德也正是这样做的。”（第264页）

这方面的问题就谈到这里为止。

现在来谈一下引起那么多议论的一个基本问题，即歌德对政治和法国革命的态度问题。在这里，格律恩先生的这部书可以告诉我们，什么是勇往直前的精神；也就在这里，格律恩先生表现了他的赤胆忠心。

要证明歌德对革命的态度是正当的，歌德自然就应该**站在革命之上**，应该还在革命爆发之前就制止它。因此，早在第XXI页上我们就已经看到，“歌德远远地超过了他的时代的实际发展，因而照他自己的看法，他只能对它采取否定的态度，只能摈弃它。”在第84页上，在谈到我们已经看到的那个蕴蓄着 in nuce（处于萌芽时期的）整个革命的《维特》的时候，作者写道：“历史处于1789年，而歌德则已处于1889年。”同样，在第28和29页上，格律恩先生迫使歌德“用不多的几句话彻底清除了所有关于自由的喊叫”，其根据是早在70年代歌德就已在《法兰克福学术通报》³⁵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根本没有谈到“空喊家”所要求的自由，而只是说了一些关于自由本身、关于自由这个概念本身的一般的十分平凡的话。其次，由于歌

德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中提出了每个立法者都有做一种礼拜的义务的论点（歌德本人把这个论点只看做法兰克福僧侣们的粗鄙的对骂所引起的一种滑稽可笑的怪论，而格律恩先生自己却引证了这点），因此就说，“大学生时代的歌德已经把革命的和当代法国的整个二重性当做穿破了的鞋底扔掉了”（第26、27页）。显然，格律恩先生继承了“大学生时代的歌德的穿破了的鞋底”，并且把它们钉在自己的“社会运动”的七哩靴上³⁶。

不用说，歌德关于革命的言论我们到现在才完全清楚了。现在我们才明白，高高地站在革命之上的歌德，在革命前十五年就“清除了”革命并把它“当做穿破了的鞋底扔掉”的歌德，超过了革命整整一个世纪的歌德，是不能同情革命的，是不能关心他在1773年就已与之绝交了的“空喊自由的”人民的。现在格律恩先生什么困难也没有了。让歌德随意地给老一套的传统智慧穿上二行诗的华美的外衣吧，让他去用庸俗短浅的眼光论证它吧，让他在威胁着他那和平的诗人幽居生活的巨大冰流面前体验一下小市民的恐惧吧，让他表现出浅薄、怯懦和下

贱吧，——无论什么都不能使他的耐心的注释者发火。格律恩先生把他举在自己的不知疲倦的肩上，扛着他走过泥泞；不仅如此，他认为踩踏泥泞的事全都由“真正的社会主义”来效力，只要不弄脏歌德的鞋子就行。从《法兰西之战》到《私生女》³⁷，格律恩先生毫无例外地把一切都承担在自己的肩上（第133—170页），表现出高度的忠诚，甚至可以使毕舍³⁸这种人都感动得流泪。……

.....

关于“人的本质”，歌德对社会和国家的批判通过格律恩先生的介绍给了我们一些什么样的解释呢？

首先，照第264页上的说法，“人”对于“有教养的阶层”总是怀着深厚的敬意，对于上层贵族更是毕恭毕敬。其次，他的特点是极端畏惧一切巨大的群众运动、一切强大的社会运动；当运动迫近时，他不是胆怯地躲在火炉背后，就是急忙卷起铺盖溜之大吉。当运动在进行的时候，它对他来说只是一个“苦痛的经验”；但是运动刚一过去，他就从容不迫地站在舞台前面，用海格立斯³⁹的巨掌打耳光（这些耳光的声音只